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

# “快跑过去，就是新天地”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祁智

□本报记者 教鹤然

记 者:祁老师好,祝贺您的作品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方一禾,快跑》面对的是儿童文学很难处理的“疾病”和“死亡”主题。您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该如何向孩子描述这类主题?

祁 智:感谢您的祝贺。我借此机会,感谢关注《方一禾,快跑》的师友,感谢读者朋友。

面对如同花蕾、如同朝阳的生命,儿童文学处理“疾病”和“死亡”的主题确实难度不小。但是,不涉及这一主题,儿童文学有“缺项”;这一主题涉及得不妥当,儿童文学有“缺失”。

我创作《方一禾,快跑》坚持两点。第一点,不刻意去涉及“疾病”和“死亡”的主题,而是当成写作的日常。《方一禾,快跑》中,爸爸在一个中午去世,虽然“突然”,但是我把这一情节处理成一天生活的一部分,而妈妈生病在床更是人生生活的一部分。我以为,生活如此,“责任”不在我。第二点,创作之前,我用30年的时间在思考,我涉及这一主题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是对“疾病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显然不是。在“疾病”面前,同情是浅显的;在“死亡”面前,恐惧是简单的。那么,是想表达方一禾的自强不息、全社会对方一禾的爱心援助?更不是——如果这样写,可能是通讯报道,但肯定不是小说。小说应该进入更深刻、更复杂,又更明朗、更宏大的层面。爸爸的“死”、妈妈的“病”、方一禾的“跑”、大家的“帮”,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以为,生命如此,“责任”在我。

记 者:您在后记《生命如歌》中写道,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30年前在北方的一次采访,“方一禾”的原型是一位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年仅八九岁的小女孩。您为何会选择在创作的时候,把叙事的主人公改为男孩?

祁 智:30年前的一个早春,我去青岛采访一个叫杜瑶瑶的小女孩。她的爸爸突然去世,妈妈重病卧床。她没有时间悲伤,因为家庭需要她支撑。她每天早上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再狂奔回家喂妈妈吃饭、给妈妈输液,然后狂奔去学校。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我跑,说明妈妈还在。那天不要我跑了,说明我妈妈没了。我要为妈妈跑一辈子!”我刹那间泪水奔涌,在蒙眬中看到了我曾经的狂奔。

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被救护车拉走抢救。妈妈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一节课下课,要狂奔到街上的肉案拿一对猪腰子,狂奔回家交给外婆,再狂奔回学校。我不知道什么是“速度”,只知道耳边跑出风声就是最快。我每天都要跑到最快。

结果是我能在上课铃响之前进校门,后果是我蹲在教室的墙边口吐白沫。我吐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是为妈妈跑的。那一刻,我又非常害怕,害怕哪天不再需要我狂奔。我想:妈妈,我愿意为你跑一辈子。

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有原型。我采访杜瑶瑶后写了长篇报道《微笑着面对生活》。在《方一禾,快跑》中,我把“方一禾”写成男孩子,是想尽可能把小说主人公与原型区别开来。作家优先考虑的是怎样便于创作,我在1997年就写过短篇小说《狂奔》,主人公“李祥”就是男孩子。何况“方一禾”也有我的影子。其实,“方一禾”有许多人的影子——我们多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奔跑过,甚至还在奔跑中,耳边呼呼生风。

记 者:《方一禾,快跑》中用宋体和楷体两种字体对不同内容加以区分,宋体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楷体是在当下的叙事插入回忆、心理活动、对话或其他场景,让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这种“插叙”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祁 智:我交给出版社的《方一禾,快跑》都是宋体。编辑老师经验丰富,他们提出来,如果都是宋体,不停地出现时空转换,会给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建议把“当下”用宋体,把“过往”用楷体区别。我非常赞同并且感激这一技术处理。

福克纳的小说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和多角度叙事,我曾经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福克纳的小说也按《方一禾,快跑》这种方法处理,可能阅读得要顺畅一些。我说,福克纳不会答应,因为跳跃、混乱、纠缠、拼凑、模糊应该是他想要的。

记 者:作品的题目特别生动,充满儿童趣味和游戏感。原本只是方一禾和同班同学追逐打闹的时候,出自班长马斯原之口的一句话:“方一禾,你快跑,我掩护。”但用作标题以后,又具有了新的引申含义。让人不禁思考是谁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将跑向何处?能不能请您谈谈是如何设计作品标题的?

祁 智:我有四点考虑。第一点,“方一禾”确实在快跑。我见过杜瑶瑶有三种快跑的姿势:

早上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双臂前后摆动;拎盐水瓶狂奔回家,双臂低垂;狂奔去学校,一手划水,一手按住背上跳跃的书包。不仅如此,我记忆里还有耳边的风声。让情节有画面感,是我小说的追求。第二点,正如您所说,“让人不禁思考

出版社,2024年11月  
《方一禾,快跑》,祁智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是谁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将跑向何处”,有悬念——我以为,儿童文学应该调动一切因素,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悬念”也是我的追求。第三点,“方一禾,快跑”朝气蓬勃,既有动感也有感染力,在沉重中有轻扬,在灰色中有亮光。不少读者朋友告诉我,读到最后,会情不自禁地喊“方一禾,快跑”,甚至不希望他停下来。第四点,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不测、不顺是常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快跑”。快跑过去,就是新天地。新的生活永远需要我们风雨兼程。

记 者:故事里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次要角色”,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少年罗小盼、程璐璐、谢菲、马斯原等同龄人,还有如韩老师、岳老师、薛老师、公交车司机马叔叔、社区王阿姨等成年人。尤其让人感动的部分是王阿姨建的微信群里的一条条信息:“方一禾起床了。方一禾点煤气灶了。方一禾门没关跑出去了……”方一禾不是一个人“负重前行”,有很多关心他的人,在他的背后默默无闻地付出。而且,直至故事结尾,方一禾都没有发现这些“无名英雄”。您为何选择把他人的付出,写在主人公成长的背后?

祁 智:30年前,人们对“弱势”个人或群体的关心比较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不怎么在乎他们的接受,考虑更多的是怎么给予。后来,人们的关心逐渐变得得体、合适,甚至不留痕

迹,充分考虑到接受者的尊严。这是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表现。当年的杜瑶瑶虽然想独自担当,不想麻烦别人,但事实是,离开了众人的帮助,她举步维艰。我当年每次都能在上课铃响之前狂奔进校门,后来才知道,哪里是我准时,是校长让门房师傅等我进了校园才敲响预备铃。不仅如此,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表现还在于,人们不再以为对“弱势”个人或群体的关心是单向的给予,人们在给予中也获得了力量、温暖和升华。这本书的背景是社会、时代,是悲悯、博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互为主角,也互为背景。

记 者:以成年人的心态来读这本儿童小说,会感到特别沉重,直至故事的结尾,方一禾感到“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在酣梦中踏上了莫比乌斯带。我听过一种说法,如果某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就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拓扑学的概念对应的是“无穷”,可以解读为主人公的苦难永无止境,也可以解读为生活和希望永无止境。故事结尾的艺术处理背后有何深意?

祁 智:莫比乌斯带是“神来之笔”。故事原本是,妈妈睡觉前在孩子手腕拴了一个铃铛,绳子拉在自己手上。妈妈需要孩子的帮助时就拉动铃铛,铃铛不响孩子就安心睡觉。但是我总觉

得这个结尾弱了,这个结尾甚至是我一直不能动笔的原因之一。后来,我给一位数学特级教师打电话,希望听听数学课。老师很快安排了“学科+”的数学公开课。我听到一位老师讲“莫比乌斯带”,立刻想到了在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根绳子,想到了方一禾在夜深人静中对爸爸的思念,热泪盈眶。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章,请老师看看有没有专业问题。老师说,虽然不知道整部小说是什么内容,但看了这一章有“说不出的难受和欣慰”。我知道“成了”。我在定稿的时候又审视了“莫比乌斯带”的结尾,我看到了“相逢”,当然也看到了“无穷”。生活之路难免曲折坎坷,但是生命必定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记 者:您曾在中学当过多年老师,后来又在出版社从事童书出版工作。文学专业的学术训练、语文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童书出版的现场观察,都为您“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您认为,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要怎样才能贴近儿童生活?

祁 智:不要以为写到了儿童和动物,就是儿童文学。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要发自内心地热爱生活,敬畏文学、崇尚经典、深入孩子、永葆童心、感谢读者,做好素材储备、精神准备。作品永远不注水稀释,不胡编乱造、不哗众取宠、不低级趣味、不潦草急就。我们共勉。

# 童话故事里藏着梦想,也辉映着文明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李姗姗

□张昊月

张昊月:《器成千年》是一本和考古有关的童话。您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本书的?为了写好这本书,您做了哪些准备?创作过程又是怎样的?

李姗姗:山是伫立的坚强,云是行走的温柔,水是流淌的包容,泥是沉默的生机——我的童年在四川乡下的大山里度过,小小的我浸润在源于自然的美学熏陶中,万物在我眼里都带着灵性与生命。父母在地里劳作时,我就坐在一旁玩泥巴。看着他们从土里挖出土豆、红薯、花生,我满心好奇:这地里还能挖出别的东西吗?直到长大后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我脑子里那个好奇的开关被骤然打开——原来,泥土里真的藏着别样的宝贝。

青铜大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这些古蜀先民的杰作在祭祀坑里埋藏了数千年,惊艳亮相时却依旧沉默无声。有那么一瞬间,青铜鸟、青铜小立人仿佛在我眼前“活”了过来,眨眨眼睛、扇扇翅膀,露出温柔的微笑。我像触电般心头一震!是啊,如果文物真能开口说话,会对我讲述怎样的故事?三千年前,它们又经历过什么?好奇心驱使着我寻找答案。我买了许多资料书,翻阅学术文章,不放过任何关于三星堆考古的电视节目与视频。但考古世界博大精深,仅凭查阅资料,根本无法真正读懂三星堆。机缘巧合下,我奔赴三星堆遗址,在那里“深扎”了整整一年。

这300多天里,我在考古一线与考古人近距离接触,见证了诸多器物的发掘与修复过程,还跟着修复师学习撰写文物修复日志。有些文物刚出土时只是不起眼的“泥巴疙瘩”,经过精心修复后才得以“重焕新生”。

“如果能写一本童话,把三星堆文化与考古发现讲给孩子听……”“深扎”期间,创作的念头在我心中渐渐萌芽。可即便手握第一手素材,面对众多文物时,我仍感到眼花缭乱、无所从下笔。既要保证文物知识与考古成果的准确性,体现科普价值,又要兼顾儿童性与文学性,避免落入俗套,这让我倍感挑战。又一个月过去,我连故事的开头都没能写好。直到有一天,我在祭祀坑边看考古队员发掘“填土”时,母亲常对我说的那句话突然涌上心头:“好好读书,长大了要成器。”当“成器”二字在脑海中浮现,看着“土样”被考古队员小心翼翼提取并存入仓库,灵感瞬间被点燃……“有一团叫堆堆的泥巴,它来自古蜀国,最大的梦想是‘成器’。”就这样,《器成千年》的故事框架逐渐清晰。小泥巴堆堆穿越三千年的“成器之梦”,让三星堆的神秘故事慢慢铺展开来。

张昊月:《器成千年》的主人公是名叫“堆堆”的泥巴,这个可爱的形象是妙手偶得,还是在您的创作准备过程中渐渐清晰起来的?

李姗姗:应该算是冥思苦想后的妙手偶得吧。在我成长



设置“文化词条”,那句“以下内容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为本书特别撰写”,承载了我们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张昊月:《器成千年》这本童话在“小”与“大”之间有很强的张力,读来会让读者产生很多联想。“堆堆”很小,三星堆文化很大,“小”“大”背后又有怎样的思考?

李姗姗:《器成千年》和我之前的《器成千年》有所不同,它是一部将个体梦想与中华文明相交织的童话。“堆堆”是一团来自古蜀国的泥巴,源自大禹治水留下的恩土,它最大的梦想是“成器”——这既是童话的主线,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自我实现”愿望的隐喻。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堆堆历经失败、灾难、等待与沉睡,最终在现代考古的场景中被唤醒,完成了从“泥”到“器”的蜕变。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神秘、独特且辉煌的青铜文明与陶器文化,尽显古蜀国的智慧与创造力。书中通过描写古蜀国的祭祀、作坊、器物制作等场景,将三星堆文化具象化、生活化,让厚重的文明变得更灵动可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再现”:被埋藏的器物重见天日,恰如堆堆从沉睡中苏醒,象征着文明的延续与再生。到了结尾,堆堆的梦想已不只是“成为有用的器物”,更是成为“文明的载体”。它最终作为“携带粟粒的填土”被展出,印证了古蜀农业文明的存在。这一刻,它的个人梦想与文明的历史使命自然地融为一体。

《器成千年》以童话中小人物的追梦故事,映照中华文明的博大与恒久。堆堆的“成器”之路,不只是泥巴变器物的物理转变,更是文化认同、历史传承与精神成长的象征。在这场跨越三千年的奇幻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梦想与一种深厚文明,在童话故事里温柔而深情地交相辉映……

张昊月:在儿童文学领域,您不断进行多种文体的写作,未来您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李姗姗:有教育家说过,不要给孩子“贴标签”,我也从没给自己“贴标签”。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创作周期里,我会有自己的“写作胃口”。儿童诗、童话、散文……身体会告诉我,此刻更想尝试哪一种。我觉得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一直在成长,不会总偏爱同一种“食物”,需要营养均衡的滋养。而我,恰好也喜欢做不一样的尝试。当我的这些尝试能和一些孩子擦出火花,哪怕只是很小一部分孩子,只要他们是真正发自内心喜欢,我就没有遗憾。

我刚完成小说《青铜神树》的修改工作,借此机会,向改稿过程中给予我莫大帮助与支持的专家前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过程中,跟我最亲近的两样东西是“泥巴”和“面团”。面团,已经被我写进了《面包男孩》,而泥巴,是我在心里一直捂着的,是小时候在我手心里被捏软了搓热了那些泥巴,成了《器成千年》里的“堆堆”。

刚想到“堆堆”这个名字,就确定是它了。“三星堆”这个名字细细品来,“星”在天上,是浪漫和光芒,而“堆”在地上,是沉默和厚重,简单的3个字,从天到地,把地域里的大气、本土里的广阔,以及那种韵律感给展现了出来。而平常考古队员们说去三星堆,都喜欢说到“堆里”去。所以,“堆堆”带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很高兴,小读者们也挺喜欢这个名字。

张昊月:《器成千年》中有洪水到来这样的惊险场景,也有月光派对这样的温馨画面,故事讲述中的场面感很强,这是出于怎样的写作考虑?

李姗姗:我在文献里读到,古蜀时期三星堆多发洪水,古城修筑城墙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抵御洪水。而“三星伴月”也是当地特有的的一大景致。

“洪水突至”与“月光派对”都是基于事实的想象,它们反差极大,“场面感”极强,首先是源于对“童话史诗”的整体定位:洪水段落是“大史诗”,月光派对是“小童话”,一个宏阔一个温馨,把古蜀文明“遥远、模糊”的印象化为儿童可感、可知、可触摸的情感体验。洪水象征“毁坏与失散”,而月光派对象征“重聚与新生”。前者是堆堆“未能成器就被埋没”的失落,

后者是苏醒后“重燃追梦信念”的希望。有小读者说,读的时候一直担心着:“堆堆到底能不能成器?后来怎么样了?”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场面感带来的参与感,让成器的故事在大起大落之间被共情。

张昊月:读者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的大面具、小立人等三星堆文物形象,在您的童话中“活”了起来,文物可以开口说话了,这类想象性描写有何用意?

李姗姗:平日里大家去博物馆,听到的大多都是“讲解风”的台词,无非是告诉我们文物的出土年代、属性、特点、重要意义等。创作时,我就想着一定要让三星堆文物“开口说话”,通过拟人化、童话化的方式,将原本静态、遥远、沉默的文物赋予生命与情感,变成孩子们的“伙伴”,使抽象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和有趣。毕竟,小孩子都喜欢好玩的东西。如果有一张桌子会对我说话,我也会很高兴。

张昊月:童话和童话后面的文化词条有强烈的互文效果,为何做这样的结构安排?

李姗姗:我们请小朋友试读初稿,觉得有些器物,比如瓿、罍、簋等以及考古知识对他们来说有些陌生,于是,我和责编张怡、陈明敏一起商量,怎么能请三星堆的专家们再参与一下?虽然他们已经在书中以角色的身份出现过,但如果能“走出”书本,和读者互动,岂不是更有意义?于是,在正文结束后